

软实力视角考量下的“中国模式”

陶绍兴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中国模式”可以分为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和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表征了中国崛起是一种硬实力的崛起,而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则意味着中国崛起是一种软实力的兴起。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是读懂中国、破除“大国崛起困境”的一把钥匙。文化是文明社会的精髓,欲对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有真正的见解,文化的视角不可或缺。基于国家软实力的视角考量“中国模式”及其未来,中国将以“和平崛起的大国”、“文明复兴的大国”、“掌握话语权的大国”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关键词:中国崛起;“中国模式”;文化;软实力;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 B 01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4)06-0001-08

A Discussion of “China Model” from the Soft Power Perspective

TAO Shao-xing

(Anhui Business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The “China Model”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e ontological “China Model” which represents the rise of China is that of a hard power, and the epistemological “China Model” which refers to the soft power rise of China. The “China Model” in epistemology is a key to understand China and break “the rising dilemma of great powers”. For th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it is indispensable to interpret the “China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lture, the essence of the civilized society. Given that “China Model” and its future represent the national soft power, China will present to the world its image of “the great power of peaceful rise”, “the great power of civilization renaissance” and “the great power of mastering its discourse power”.

Key words: China Rise; “China Model”; culture; soft power; discourse power

一、中国崛起之迷思：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与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

中国崛起是“中国模式”的载体,也是“中国模式”的先行叙事。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由于中国不可避免的快速崛起,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攀升。一些媒体将中国崛起誉为“中国奇迹”。为了解开中国崛起之迷思,“中国模式”一词应运而生。

1. 正确的界划：窥“中国模式”堂奥之关键

讨论“中国模式”,必须谨防陷入无谓的文字游

戏,以使其避免肤浅化的理解之灾。“中国模式”是一个具有多层次意义的概念,邓小平首次提出了“中国的模式”,而美国资深媒体人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则赋予了她以全新的内涵。此后,关于“中国模式”的有无之争、特征之争和意义之争,只有依靠避免界定概念的方式才得以持续不衰。这乃是西方分析哲学早就指出的,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本来是很严肃的学术探讨,经常变异为抽象的术语之争。

因此,对“中国模式”的误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误解,而是为了试图理解而发生的误解。这种误解太常见了,以至于人们对其视而不见,

收稿日期: 2014-10-16

作者简介: 陶绍兴(1976-),男,安徽芜湖人,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听而不闻。为避免产生歧义,首先要对“中国模式”这一概念予以正确的界划,这是窥“中国模式”堂奥之关键。从哲学角度分析,“中国模式”可以分为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和价值论的“中国模式”。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讲的是客观事实——中国崛起的客观事实;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讲理论概括——中国崛起之道的理论总结;而价值论的“中国模式”讲的则是评价原则问题——中国崛起之道的普适性问题。

由于首先清理出了理论探讨的地基,我们发现,正是由于学术界将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和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不加区分地相提并论、混为一谈,故而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与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前者是作为现实对象予以把握的,是中国经验的归纳,而后者则是作为认识对象予以把握的,是整个理论模式的概括总结;前者是指形而下的实践,后者则是指形而上的理论;前者是自在的,后者则是自为的;前者表征的是硬实力,后者表征的则是软实力。

2. 一种事实与另一种事实的比较: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客观存在

存在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吗?在国外,很多学者持否定态度。里奥·霍恩就认为“中国模式”值得怀疑,他认为:“中国模式一说至少有三重含意:成功、可复制性和周密计划,这三个方面都还有待商榷”^{[1]12}。“温室论坛”也指出:“提出问题部分是为了回答它,该模式之所以存在,主要是靠人们相信它的确存在”^{[1]31-32}。在国内,一些学者以目前中国的模式是不完美的为由,也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乍看起来,这种观点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终究是站不住脚的。若依此观点,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模式,因为完美的“模式”只能存在于宗教幻想当中,只要是人参与其中的东西,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一些学者以“中国模式”处在变动之中、没有定型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这也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所有模式都处于变动之中,若坚持完全定型的东西才是“模式”,那就承认了“模式”必然是僵化的,这显然是错误的。

其实,考查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不应该用一个概念和另一个概念相边角,也不应该把事实和概念作对照,科学的办法应该是把一种事实和另一种事实相比较,就是说,要根据现实的经验来判断,而不宜带有任何神秘的色彩。改革开放后,中国仅用短短三十几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现代性道路,堪称21世纪的奇迹;30多年里,整个中国社会焕发出勃勃生机,世界近一半的人口贫困问题是由中国解决的,整个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30多年来,中国政府从容应对诸如汶川地震、非典疫情等各种重大突发事件,经受住了各种各样国际风云突变的严峻考验;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出色举办更是展示了中国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以上诸事例清楚地表明:中国不可避免的崛起从而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客观存在是一个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关于这一点,即使西方学者也不持异议。

3. 问题域的转换:呼之欲出的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

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尽管在事实收集方面令人倍感鼓舞,却与真正的理论问题失之交臂。康德曾指出,经验提供的只是事实,而不是规律。确证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客观存在只是探究的第一步,接下来必须建构出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

把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与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同一起来是一种批判的行动,在这种行动中证明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或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的现实性与合理性。诚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必然性与无限杂多的事实是两回事。他说:“思维的范畴总是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是不能在感觉之内预见的,并认为经验的事实,无论就内容或形式而言,都是与思想的范畴不同的”^[2]。不可否认,关于“中国模式”的认知还不够深入,有许多方面尚待挖掘。因此,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便是促成经验事实的财富向思想理论财富的转变,也即要实现自在的“中国模式”向自为的“中国模式”惊险的跳跃。“因为一切仅仅归结为某一件事要说明的事实要考察两次:一次做为事实,另一次做为抽象的规律,做为说明的本身”^{[3]151}。本体论

层次的“中国模式”向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过渡必然是一个充满艰辛的劳作过程，目前还没有脱离其源始的阶段：机械论的残余依然存在，因为谈到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时，人们习惯于把她作为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的“附加物”和“补充”，作为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的仆从。马克思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4][1]}。如何建构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称得上是21世纪的难题。因为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直接地“崭露”，必须通过概念的生产建构出来。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我们严格区分了各个层次的“中国模式”的概念，从而使得我们成功地实现了问题域的转换：中西学界认为“中国模式”客观存在的，多半意存在指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那些反对“中国模式”的学者，一般是指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尚不存在，对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客观存在也不持异议。现今，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中国模式”，它已经被置换为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模式”。而欲认识与发现“中国模式”，即对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有真正的见解，文化的视角不可或缺。

二、不一样的局面：文化视阈下的“中国模式”

新世纪新阶段，如何叙述并构造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文化议题。因为文明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等要素，而文化又是文明社会的精髓，因此也是理解“中国模式”及其可持续性的关键。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中学到什么，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中国文化是“中国模式”的源头活水。我们应从文化因素理解经济繁荣内在的驱动力。从文化视角切入“中国模式”，寻找到经济崛起背后的理念崛起，以期实现中国全面的崛起，是中国知识界的重要担当。

1. 历史的见证：“中国模式”与文化崛起的相关性

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并不是理论家们发古幽思之产物，而是具有坚实的内容的，有其自身的结构与层次的。著名的人类文化学家、功能学派

创始人之一的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Bronislaw Kaspar）将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器物层次，主要指生产方式；二是组织层次，也就是社会、经济、政治组织；三是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观等。理解“中国模式”，要有一种大历史的视野。

“中国模式”的运演路径离不开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筚路蓝缕，艰辛且漫长。用大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运演路径见证了其与文化崛起的高度相关性。其中的三个盛世时代——西汉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和清朝的“康乾盛世”，中国都是以自己的文化的影响力而不是经济和军事实力赢得世界的尊重。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而又过于自负的古老大国的大门，中国人民被迫开始“睁眼看世界”。当时从清政府的官僚到知识界都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当时的有识之士看到中国在器物层面明显落后于西方，“西化”一度成了“先进”的代名词。一些人主张全盘西化，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有了洋务运动，组建了北洋舰队。然而，在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的惨败惊醒了国人，先进志士们意识到，必须在“制度”和“组织”层面改良中国，由康有为和梁启超大力倡导的戊戌变法反映了对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关注，可叹的是，戊戌变法百日即寿终就寝。之后，民国政府开始从制度层面，学习西方的总统制、三权分立制度，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国家独立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所以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袁世凯集团所窃取。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及至辛亥革命的接连失败，我们深切地体认到：仅学习西方的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是不够的，必须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新文化运动由此开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共产党人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救国图存，因为旧的传统文化不能应对现代化的挑战，故而必须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予以改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中国的革命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恩格斯曾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

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東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5]。20世纪末的二十几年至21世纪初,我国又一次经历了“器物的革新”、“制度的革新”和“文化的革新”路程。70年代中期,周恩来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要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

当然,回顾“中国模式”的历史不是恢复中国过去的历史,停留在古老文明的功劳簿上,而是创造中国现在和将来的历史,续写中华文化的辉煌。

“一国的历史和文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会以何种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历史上每一个曾经称霸的国家或者大陆都会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展示其实力。比如欧洲的典型方式就是海上扩张加殖民帝国,而美国则是空中优势和全球经济霸权。中国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后,很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文化等方面完全改写世界秩序”^{[6][89]}。

2. 理念的崛起:“中国模式”的深层意蕴

一国的模式决定该国的兴衰成败,“中国模式”也不例外。中国崛起催生了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经济崛起为我们搭建了对外国际交流的平台,但不能就只是从经济视角来考量“中国模式”,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晚清时代的中国在经济总量几乎接近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却很快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因此,仅谈经济总量作用是有限的,只有文化才能支撑得起“中国模式”走得更远。龙永图曾撰文发问:没有文化的支撑,经济何以走远?

“什么时候才能使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精英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去留学;什么时候才能使全球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更多地看中国的电影、听中国音乐、阅读中国的书籍;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选购产品的时候,更多的是选择中国的品牌。这三个问题就像一盆冷水,使得我们讨论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问题变得非常非常地没有意义。因为,这三个问题确实打中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7]。

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就是关于中国崛起的叙事。建构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的过程,就是寻求中国崛起之道的过程。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降,中国人民创造了精彩纷呈的“中国故事”,如何将“中国故事”娓娓道来,讲得生动、

动听与耐听,需要挖掘出“中国模式”的深层文化意蕴。不能把文化视为一种消极的、被动的因素:它既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发的派生物,但若脱离经济因素,文化也无法独立自存地发展。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向正确认识跨出的每一步同时也是把这一认识变为现实的一步”^[8]。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将会表明中国不会与西方文明融为一体,中国崛起必将会产生自己的理念。理念的崛起深深蕴藏在“中国模式”中。杜维明指出:“如果不是文化的崛起就不是真的崛起,崛起的背后要代表一种真正的价值和文化,不是在中国崛起中文化起了什么作用,而是说如果中国真正要崛起必须是文化的崛起。没有文化作为后盾,或者没有文化来代表中国,不可思议……中国给提供了一个参考,提供了新的方向,这就是我们崛起了”^[9]。关于“文化软实力”,杜维明作了这样的解读,“这个软实力就是一种去影响别人、影响世界的核心价值的魅力,或者叫文化的吸引力。‘文化软实力’所塑造的不管是制度还是人,成为大家模仿的对象才是有影响的。历史上,中国文化长期就是扮演这种角色,世界各地的人都来朝贡,而且非常积极。这个社会对世界各方有很大的吸引力,核心价值被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这就是现在所谓的软实力”^[9]。

三、软实力的兴起: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之于世界的意义

“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实力衍生出软实力”^{[10][89]}。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是读懂中国、破除“大国崛起困境”的一把钥匙。基于国家软实力的视角考量“中国模式”及其未来,中国将以“和平崛起的大国”、“文明复兴的大国”、“掌握话语权的大国”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1. 和平崛起:“中国模式”的开创意义

根据西方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强必霸是不可避免的规律。历史上,不管是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还是后期的英国和美国,每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都是一次血腥大洗牌的过程。英国称霸全球靠的是拿破仑战争,美国崛起为全球

霸主靠的是二次世界大……他们由此类推出:中国崛起为下一个强国后也跳不出这一大国兴衰历史周期律。塞缪尔·亨廷顿总结说:“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10][30]}。马克思指出,西方列强的成长史就是一部辛酸的血泪史,“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1]。这些列强国家信奉实力至上,“丛林法则”主宰一切,一切都要为资本让路。为了达到资本原始积累的目的,可谓不择手段、机关算尽。列宁也曾给予了无情的讽刺,“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是一定会被推翻的”^[12]。

西方学者忽略了中国文化的和平秉性,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崛起必然也逃不过“国强必霸”的周期律的魔咒,中国崛起之后也要像西方列强那样重走霸权主义的老路。“中国威胁论”遂在国际上被炒得沸沸扬扬。究其实质,“中国威胁论”乃是西方学者不动脑筋的惯性思维的产物。“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中都存在一种自然倾向,即根据自己熟知的情况来判断陌生事物:我们都是彻头彻尾的相对论者。一旦发现熟悉的对象和行为模式,我们就会认为它们与我们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6][81-82]}。事实胜于雄辩,至少可以这样说,截止目前,中国还没有威胁到世界和平,反而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中华文明的本性决定了中国会开辟出一条异质于西方列强崛起所走过的殖民化道路——和平发展之路。中国民族的血液之中没有称霸世界的基因。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就是典型的例证。当时,我国的综合国力、军事实力已拔得头筹,与西方列强依仗炮船、舰队疯狂掠夺资源和财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对外展现的是中华灿烂文明和大国国威,并未在海外开辟一块殖民地,在30多个亚非国家留下的是友谊与和平。

“中国模式”讲求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中国的发展对世界不是威胁,而是互利共赢。环顾当今之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加珍视拥有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有且只有中国才能开辟且走出一条合作开发、互利共赢的道路。以“中非能源合作”为例,它并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不是通过野蛮暴力手段攫取非洲资源,而是完全建立在中非相互

需要、相互信任、平等合作、彼此共赢的基础之上。

2. 文明崛起:“中国模式”的举世意义

吴晓明认为,中国模式“不仅能够使自身完成现代化的目标与任务,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孕育着开启人类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13]。中国坚持走互惠式的和平发展道路,那就不但要树立“和平崛起的大国”的形象,还应树立起“文明复兴的大国”的形象。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国际秩序,而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则雄辩地证明了,野蛮和杀戮不能征服一个国家,文明才是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力量所在。

(1) 西方化还是中国化:两种文明之比较。面对中国崛起,西方仍然墨守这样一条规则,中国可以变得富强,但西方的文明仍将会统领世界。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尽管是静悄悄的改变。

“中国模式”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心中的思维定式:西方化就是现代化。其实,西方化只是现代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对现代化的回应。所谓的“西方现代文明”不具备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第一,西方列强的现代化进程无一不是具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对外建立殖民地,实现武力扩张;对内疯狂压榨工人、农民,为资本原始积累铺路。第二,西方的现代化运动,只鼓吹消费而不懂得节制,肆意以破坏子孙的生存空间为代价,满足当代人的欲望,这注定了使全人类再度身陷严峻的生存危机而不能持续。第三,西方现代文明在把社会生产推向最大化,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生活的各种需要,它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必将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一个“死”字,是西方现代文明的逃脱不了的悲情结局。西方现代文明倡导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寅吃卯粮),而地球上的资源却是有限的,所以,现代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预示着将整个人类带入一条不归路。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欧美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决定了他们没有能力持续支撑现代工业文明,而不得不诉诸于源源不断地向外扩张和殖民。

文化内在的价值指引功能能够起到引导大众的作用,因此使得整个西方感到不安。在此背景之下,西方国家不但不西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却推出了“文明的冲突”论竭力为自己辩护。“‘文明的冲突’理论的基础是一个正确的判断,即文

化多元性将是全球一个持续存在的特点,然而它的根源仍在于西方与世界其余各地相抗衡这样一个过时的观念。它的前提是只有西方式的地方知识才是可普遍化的(即便说不是普世化的话),为西方特殊论辩护”^{[14]317}。

既然我们已经理解了对手的观点,而“理解并现实地估价对手的立场和理由(而有时它们却原来是全部以前的思想),恰好就是表明摆脱思想体系的桎梏(这是指卑鄙的盲目的思想体系的狂信而言),也就是抱着‘批判的’观点,而这是科学研究中唯一有成效的观点”^{[3]27}。“华盛顿共识”远不是问题的解决,恰恰相反,它正是问题之所在。“华盛顿共识”的危机本质是一种价值的危机。可以非常肯定地讲,“华盛顿共识”的危机本身不会直接造成主要的世界历史事件;它只能创造出我们比较有利的基础,以传播一定的认识论层次的方法、提出和解决那些包括发达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整个下一过程的问题的方法。冷战已经结束,可是冷战思维并没有终结。“世界上既有粗暴的对抗,也有令人鼓舞的和解,这就迫使我们超越‘非此即彼’的认识论层次,按照色彩和人生的多样性去认识想象中的全球社群。从儒学观点看东亚现代性,会有助于我们养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14]318}。

“中国模式”问题的实质在于东方农业大国如何走向现代文明。古老文明的复兴是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的生命力之所系。中华文明一向倡导“节用有度、富而行仁”的生活方式。“中国衡量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不是征服自然的程度,而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程度,社会也被认为是自然的一部分。文明的基础不是扩张,而是节制,其中充满着精神文明的传统,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受到各方面的维护。由国家建立的各种维持现有关系的机制保证了财富积累的连续性,但与欧洲方式不同,这些机制并不是要扩大再生产,而是要限制需求”^[15]。中国自古以来从来都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谋求国家利益,因为对古老的中华文明的真正挑战的不再是物质财富的匮乏,乃是道德观的覆灭和道德体系的坍塌。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统一大陆之前,世界各国都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国,无所顾忌地欺负中国。从物质方面说,就是现在中国和西欧各国、苏联、日本等相比,也不比过去受屈辱的那个世纪强大多少。虽然如此,像今天高度

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两千年期间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是仍在继续发挥作用”^[16]。

欧美国家自诩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对东方现代性闻而不闻、视而不见。中国奇迹令西方国家感到惊奇与困惑,一部分有识之士提出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汤因比在中国改革伊始就如此断言:

“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17]。中华文明的全面复兴决不至于引起全球范围内文明的冲突,与此相反,它将和其他各种文明共生、共存和共荣。因此,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将有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与长期稳定。

(2) 全球化与本国化的统一:“中国模式”的方法论价值。“中国模式”的成功,无情地驳斥并证伪了“历史的终结”论,对于我们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软实力”一词的提出者约瑟夫·奈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18]。“中国模式”既遵循了全球化的发展逻辑,又富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以我为主,批判借鉴,尽可能使其“中国化”。只不过名称各异,清朝时期称之为“中体西用”,民国时期称之为“中国本位”,现在称之为“中国特色”。

把借鉴人类先进文明和走自己的路结合起来,是“中国模式”的一大法宝。“中国模式”的成功证明了基于每个国家的国情千差万别,所以每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均具有异质性,相互之间应当相互借鉴,然而绝不存在所谓的“普世性”模式。存在“普世性”的模式乃是一个抽象的谎言。“华盛顿共识”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的不同需要和经济、社会及文化状况,因此不能武断地说“华

盛顿共识”是普适的模式。同理,“中国模式”也不是“普世性”的“模式”。如果说“中国模式”具有“普世性”的意义,这个“普世性”便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本国化,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亨廷顿也曾注意到了非西方文化的复兴进程,“西方主宰天下的时代正在终结。与此同时,西方的衰落和其他权力中心的兴起正在促进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文化的复兴进程”^{[10][71]}。

由于坚持了全球化与本土化两个维度,使得“中国模式”最具有适应性。中国曾和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一样,同处于贫穷落后状态。如今,中国的显明成功给正在探索走出不发展困境的这些国家树立了一个新的典范。对于那些苦于不发展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模式”的吸引力愈发彰显。“中国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一轮增长”^[19]。可是,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对于这些国家只具有纯粹文献的意义。诚如近 170 年前,好事的德国哲学家试图将“法国模式”原封不动搬到德国时,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批评说: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4][298]}。

“中国模式”的魅力恰恰在于她是独特的,而不是普世的,因此,是无法直接移植到广大亚非拉国家的。中国对外只输出产品,不输出“中国模式”。

3. 话语崛起:“中国模式”的反霸权意义

“中国模式”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绝对的、不偏不倚的客观观察和描述,它必然关涉到观察者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判断问题。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模式”国别因素愈发明显,欧美国家担心“中国模式”对他们的价值观产生冲击,但一时找不出适当的应对之策,故高度敏感且缺乏自信;而我国的周边国家则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从中国崛起中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的,另一方面又担心国强必霸,故而经济上依赖中国,而安全上又仰仗美国,文化上迷信美国;金砖四国中的印度和巴西,由于和中国处于同一竞技场,所以紧盯中国不放。

在“中国模式”的中国语境中,我们认为政治

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和话语权均等化是未来世界的大势所趋,“中国模式”的横空出世,标志了西方“话语丛林”的终结与中国话语的兴起。

放眼当今之世界,直接的经济、政治殖民主义已经无法立足,然而文化领域中殖民幽灵依旧在各国徘徊。二战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军事占领、美元强权和“美国梦”等各种手段不遗余力推行文化殖民。美国的文化殖民裹挟在“华盛顿共识”中向全世界兜售。中国崛起的故事改写了“历史的终结”的强势独白。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是对中国崛起的叙事。在大数据时代,关于“中国模式”,我们已经拥有了如山的资讯,且这些资讯仍然在以几何级的速度在增长,我们还要增强说故事的能力,对“中国模式”予以叙事。面对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知识界必须要从“言必称美国”的殖民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从一种策略性话语真正转变为一种主体性话语,从理论议题的应对模式转变为自主建构模式,转变为具有中国内涵的概念生成和思想创造体系,已构成当代中国学术的核心议题”^[20]。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大国崛起的核心是思想崛起。没有思想的崛起作为支撑,大国的崛起只是昙花一现。表达思想的软实力,即话语权攸关“中国模式”的前途和命运。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刻不容缓。“西方作为霸权的一方一直企图用强制手段主宰其他地方,而其他地方又通过劳工、资本、人才和宗教等多方面的迁徙移动而全面渗透西方。现在是时候了,各种文明之间该本着相互依存的精神开展对话了”^{[14][323]}。

建构出关于“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中国知识界责无旁贷。为此,要把握住两个问题:一要认识到建立话语体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那些掌握话语垄断权的国家不愿倾听不同的话语,不愿意理解不同的声音,他们操控着所谓的“标准话语体系”到处叫嚣,维护话语霸权不仅关乎他们切身的利益,还涉及到深层的价值观念及信仰基础。“历史的终结”本身已经终结,就是西方学界也不否认,“我们很快将要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是已经能感受到接受一种新鲜事物是多么困难:我们早已习

惯了当代世界处理问题的套路,从骨子里认定它们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活生生的事实”^[6],但是西方式的傲慢并不因此而有所收敛。二是话语体系应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伴随“中国模式”这概念的兴起,中国的话语体系俨然将要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秩序的标杆。尽管西方话语的霸权地位岌岌可危,但不应该简单地抛弃西方话语,而是扬弃,即“既克服,又保留”。中国学者应秉承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从受动思维中转变过来,通过研究中国故事,提炼和深化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在普及“中国模式”的基础上,让世界了解和认同“中国模式”。

四、余 论

“中国模式”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但不能仅在自己的领域内自说自话。为此,应对“中国模式”的概念做一番批判性的梳理,进而为严肃的学术探讨奠定基础。可以采取“语义上溯”的研究策

略,将此话题置换为语言问题,以语言方式进行研究与论证,唯此,可以避免空洞的、永无结果的争论,摆脱研究困境。

“中国模式”可以划分为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和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前者改变了中国,而后者可以解释中国。解释中国是为了更好地改变中国,在改变中国的过程中也能提升对中国的认识与理解。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通过改变中国进而改变世界,而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通过解释中国进而解释世界。之后,在更高的程度上循环往复,不断递进……。

从整体上看,西方现代文明目前仍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新世纪文明正在向中国发生位移。聆听“中国模式”的元叙事,我们发现:经济、政治落后就要挨打、挨饿,文化落后就要挨骂。中华文明是“中国模式”的根脉,为世界文明提供了道德方向。现在,中华文明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之上,我们可以乐观地展望,新文明的晨钟必将在中华大地上敲响。

参 考 文 献

- [1](英)斯道延·坦尼夫. 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A]//王辉耀. 中国模式:海外看中国崛起. 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
- [2](德)黑格尔. 小逻辑[M].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29.
- [3](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札记[M]. 葆煦,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4]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9.
- [6](英)马丁·雅克. 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M]. 张莉,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 [7]龙永图. 没有文化的支撑,经济何以走远[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6-07.
- [8](匈)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41.
- [9]杜维明. 中国的崛起需要文化的支撑[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6):35-39.
- [10](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等译. 新华出版社,2010.
- [11]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9.
- [12]列宁. 列宁全集:第1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1.
- [13]毛莉,耿雪. 让中国梦照耀中华民族的前程[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9-29.
- [14]杜维明. 多种现代性:东亚现代性涵义初步探讨[A]//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程克雄,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 [15](俄)A·B·维诺格拉多夫. 中国文明发展的新阶段:起源与前景[A]//王新颖. 奇迹的建构: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52.
- [16](英)汤因比, (日)池田大佐.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 成都:四川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294.
- [17](英)汤因比. 历史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94.
- [18]詹得雄. 国外热议“中国模式”及其启示[N]. 参考消息,2008-03-27.
- [19] MARK LEONARD. “Chinese Soft Power” [EB/OL]. <http://markleonard.Net/journalism/chinasoftpower/>.
- [20]万俊人. 大家论道: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诠释中国现代性[N]. 人民日报,2012-09-07.